

西方关于中国和埃及 文明起源研究的启示

王 青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author's academic knowledge about the west scholars' works. During the visiting to London in 2002 - 2003, the author collected and read some west scholars' works written by Robert J. Wenke, John H. Bodley, Gina L. Barnes, Stephan Seidmayer and Sarah Allan, which concerning to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s of Egypt and China civiliz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ir academic views on the origins of Egypt and China civiliz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bronzes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domestic field.

Key words the West; China and Egypt; origin of civilization

摘要: 本文是笔者在访问英国伦敦期间收集、阅读西方学者有关文明起源方面论著的心得体会, 包括介绍 Robert J. Wenke, John H. Bodley, Gina L. Barnes, Stephan Seidmayer 和 Sarah Allan 等学者的论著, 并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认为, 西方关于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研究以及我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些观点对于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

关键词: 西方; 中国和埃及; 文明起源

2002年~2003年, 笔者赴英国伦敦大学(UCL)考古学进修一年, 在英期间有针对性地阅读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环境变迁和社会演变的论著, 其中包括研究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方面的论著, 感觉他们有些观点能对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启发, 故不揣浅陋, 将读书心得撮要集结刊出, 一方面是对自己在这方面学习和研修的总结, 另一方面也想以此为现在的学术探讨尽点力量。

一、西方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

截至目前, 我国考古学界对西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了解最多的, 莫过于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 他的主要著作现在都已出版了中译本。与此类似, 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主要通过张氏的英文论著来了解中国考古资料, 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也多是在张氏

观点基础上进行的。在英期间, 笔者有选择地读了几本西方关于这方面的综合性著作, 主要包括 R. J. Wenke 的《史前史发展的模式》^①、J. H. Bodley 的《文化人类学: 部落、国家与全球体系》^②和 G. L. Barnes 的《东亚文明的兴起: 中国、朝鲜和日本考古学》^③等, 从中能大体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些新观点, 下面摘要介绍。

张光直曾把中国在公元前 3000 年纪即龙山期所取得的文化发展成就归纳成八项特征, 以显示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进程: (1) 开始红铜冶炼; (2) 复杂的轮制技术的广泛传播和陶工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经产生; (3) 一些遗址发现的夯土墙表明战争防御的需要; (4) 发现于水井、乱葬坑和其他条件下的人骨表明了战争的存在; (5) 在艺术品上使用动物

和其他纹饰母题表明了社会地位的差别; (6) 兽面装饰的玉器和其他物品表明礼仪系统已经产生; (7) 占卜的广泛使用也表明了各地礼仪之间的相互联系; (8) 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层与财产差别。在这八项特征中, 张氏格外强调甲骨占卜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关键因素是萨满教的强烈盛行, 在这个有着极深宗教基础的文明中, 从国君、贵族到平民都被安排在一个分层的宇宙当中, 这个宇宙的顶极是上帝, 它通过巫师把自然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沟通起来。通过甲骨来占卜, 以遵守上帝的意愿, 国君就拥有了神谕的权力。进而他指出, 在这样一个以宗教和抽象的宇宙观为底质的文明中, 工艺技术的作用减小了, 这就可以解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Wenke的著作着重于从宏观上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异同点。他在张氏的八项特征基础上认为,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 使用玉器和占卜等是中国特有的, 但阶层分化、职能专门化和行政复杂化则是它们共有的特征。但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原因上, Wenke在承认战争对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 认为在解释社会复杂化和不断增加的差异性时, 战争说可能过于简单了。为此, 他提出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中, 一直起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居住在农业中心地带边缘的游牧和半游牧族群, 一些历史文献证明, 中国早期国家的建立就与这些游牧民族有关。例如, 文献证明周人就是在不断受到邻近的游牧民族的压力下, 才由太王率领迁到陕西中部的。”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表现上, 他则比较关注大型建筑的意义: 与其他文明一样, 中国文明起源首先是在农业长足发展和定居聚落社会产生后开始的, 但在世界其他地区, 这一阶段之后是陶器风格在广大地区的迅速传播以及建筑和墓葬复杂性的迅速增加; 而在中国, 那种宏伟的大型建筑却出现较晚, 而且规模也小了许多。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过程, Wenke继续通过技术和建筑的视角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 得出了与张光直稍有不同的结论: 西方学者往往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社会演化的原因, 但商代青铜器的出现却只是一个文化风格现象, 而非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殷墟的祭祀和行政设施在规模上或许并不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逊色, 但殷墟不同使用

区域的专业化程度、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对农业和经济的管理水平, 却使人想起两河流域一个公元前四千年纪的城邦; 商代末期中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城市, 但与两河流域和中美洲相比, 商代的中国仍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低的社会, 还找不到像乌尔或特的华坎那样规模宏大的城市。所以, 如果按两河流域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文明至少在早期还没有苏美尔人的城市 and 大型建筑。

Bodley的著作偏重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演化进程。他不同意中国学者所普遍认为的部落是国家起源的必经阶段的观点, 认为部落这一概念使得原始平等 (egalitarian) 文化的特征及其向大规模文化转变的细节模糊不清。为此, 他主要引用了弗雷德 (Morton Fried) 的观点。弗雷德观点的核心是否认国家出现之前有部落的存在, 而认为是国家的出现才导致了部落的产生。他引用中国考古材料论证认为, 前国家文化或许真的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就像张光直的原始中国相互作用圈所推测的那样, 但从考古学上看, 龙山文化在酋邦和国家产生之前, 并非处在同一个政治中心统治之下的统一“部落” (tribes), 所以前国家文化并不能在政治上组成哪怕是分散的 (discrete) 部落。由此, 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 从原始平等文化到等级 (ranked) 文化 (即酋邦) 再到能演变成国家的阶层 (stratified) 国家。其中原始平等文化在社会地位和基本资源上社会成员是平等的, 而等级社会则只限于保证社会上层成员, 而阶层国家则更只关注关键的生存资源, 这就使得强迫他人接受其政治权威成为可能, 国家就是由单个社会经由社会分层形成的。他进一步论述: “一个已进入国家形成中的分层社会就像一个城邦 (city-state), 它把周围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看成是自己权威和资源的来源。所以, 在它扩张过程中就能在边远地带 (hinterland) 产生部落”, 部落是国家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侵略和统一的结果。这些部落即小规模自治社会因为已经远离国家权力中心, 可能仍能独立处理自己村落的事务, 但再也不能对抗国家权力了。这样, 他就把通常所认为的“从部落到国家”解释成了“从国家到部落”。

从上述观点出发, 弗雷德提出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社会结构和组织演变上的新认识: 仰韶文化由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地位差异表

明它已有等级划分，因而已是酋邦组织了；龙山文化和后来的商文明由大型建筑和技术专业化所代表的更大规模对劳动力的调动，反映了社会的高度分层，因而它们不是大的酋邦就是国家了；他明确反对中国学者认为商文明是由商“部落”对抗周围部落的战争起源的，他认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分散的商部落存在，而是当地小规模农村社区逐渐等级分化和分层才发展出商国家的。

Barnes的著作运用考古资料详细论述了中国从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中关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兴起的阐述较有新意。中国复杂社会的产生往往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但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复杂化发展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在广阔地区出现了，即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三支文化均以精美玉器而闻名于世，并且它们的社会分化、技术专业化和公共建筑均有很大发展。从考古遗存看，这些文化显然不是龙山文化的附属物，而且有些文化还向中原地区贡献了文明因素，如良渚玉器上的兽面就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则具有如下特征：发达的陶器和玉器工艺技术，对家养动物尤其是羊和牛越来越依赖，社会分化不同程度存在，玉器、象牙器和龟甲用于仪式和对外交换。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但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出现了社会冲突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聚落形态——城。

中国青铜冶炼的起源至今还是一个谜。20世纪早期外国学者曾经认为，红铜和锡的合金青铜是惟一的，因此它不可能第二次发明出来。他们认为这种冶炼技术应起源于西亚，因为西亚青铜器的年代最早。而近年来的研究又认为东南亚是源头，这些观点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对青铜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在中国北方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和红铜器及其残片，包括耳环和刀等，而且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目前还不知道这些铜器的产地，而且这些数量很少的金属器无论是当地生产的还是进口的，都不能改变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性质。中国大规模生产青铜器是在公元前两千年纪之初真正开始的，到公元前两千年纪之末已出现了好几个地域性的青铜冶炼传统，包括吴城、三星堆、新干以及北方系青铜器，这些青铜文化更注重对人和动物的写实性刻画，而商王朝

青铜器则更偏爱把人和动物表现为饕餮。二里头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夏文化，但二里头的青铜器仍属于后来遍及中原地区的商王朝青铜器传统。商王朝的青铜器尽管是最早的，而且恐怕也是最辉煌的，但它也只是众多地域传统中的一个。商王朝的青铜器是在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结构最终把中国历史引向了王朝社会。

欧亚大草原是由一系列广阔的干草原组成的，它的东端是蒙古高原，并与中国大陆的黄土高原相接。根据这里的考古发现可知，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在高原的南部边缘狩猎野马、驴、牛和羚羊，进入全新世，高原拥有了更富饶的自然环境，这里发现的编织纹陶器属于冰后期使用细石器的猎人和渔民，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则是农业经济形态。进入历史时期，又变成了游动的畜牧人放牧羊群和马群的家园，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以马车、在东周时期以骑兵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中国北部边境上的居民是如何经历从狩猎到农耕再到游牧的生存方式的？通常认为是不加重的干旱导致了这一变化，但是用气候变迁来解释人类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自然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对气候强加的环境局限性的能动反应。的确，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人类往往只有有限措施来应对特定的气候环境，但人类往往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来发现征服自然局限性的能力。因此，在蒙古高原周边出现的畜牧业可以视为对草原环境的反应，这种草原环境是由公元前三千年纪冰川融水减少造成的，但环境变迁因素并不能解释游牧业所以成为开发广阔草原的生存战略。

有人认为导致游牧业产生的关键因素是马和马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它们使草原民族及其牧群为寻找更好的牧场而游动自如成为可能。简单的游牧业可以与定居的村落生活结合在一起，而游动的畜牧业却要求一个不断变化的聚落形式，以及可用来驮拉和骑乘的家养动物。这种对家养动物的第二次利用，包括对畜力、奶汁和皮毛的开发利用，已经超出了把兽肉、角、骨头、牙齿用做工具的意义——因为这构成了继第一次革命“驯化”之后的“第二次产品革命”。这第二次产品革命最初并不发生于蒙古高原，而是兴起于西方的欧洲中部和近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轮车

交通工具的发明,它使全幅开发草原成为可能。马车后来传入了中国,安阳殷墟出土的马车(公元前1300年)也是整个东亚年代最早的马车。骑马作为一种技术也是从欧亚大草原西部传入的,骑兵的出现曾迫使中国东周时期的北方诸侯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很长的防御城墙。从文化上看,中国北方边境上自公元前1000年早期开始出现的游牧民族属于起源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文化传统。

二、西方对埃及文明起源研究的启示

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美国考古学家 R. J. Wenke 曾经指出: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相比,古代中国也许和古代埃及最像,尤其表现在艺术成就和自我融会贯通上。在英期间,笔者通读了德国考古学家 Regine Schulz 和 Matthias Seile 主编的《埃及:法老的世界》(1998年英译本)^④,其中由 Stephan Seidlmayer 撰写的第一、二章对埃及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了精当阐述与研究,从中得到一些重要启示。以下予以简要介绍。

埃及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此之前的那可达文化(Naqada Culture)(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为三期)属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前王朝时期。Seidlmayer 认为对外贸易在埃及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那可达文化二期已向北与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密切的商贸联系,向南与努比亚地区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然资源,包括象牙、铜矿石、上好石材、木材和兽皮等。那可达文化在埃及当地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那可达文化主要分布于上埃及,但其二期的墓葬已在埃及北部发现,说明那可达人已把这里视为北方边界占据了很长时间。而最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二期之末那可达人已到达了埃及的三角洲地区。贸易往来就是这样把上下埃及连成了一个大文化分布区。贸易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原料交换,密切的贸易往来还使这两大地域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这一网络或许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统治机构,但能使各种不同价值观得到认同,使各种社会和组织结构得到相互适应、合作与竞争。显然,这一过程并非政治统一的结果,而恰恰是政治统一的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埃及出现了由城镇(town)

组成的早期城市中心(urban center)。位于上埃及的 Hierakonpolis 就很可能说明这一进程。有证据表明,从那可达文化一期开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长达3公里、宽约400米的聚落,而从二期开始,这里开始了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进程,并发现了制作各种工艺产品的专业作坊和用于储藏粮食和食物的干燥炉。这些发现揭示了城市中心的一个重要功能。专业技术集中于此说明了工艺产品和农产品的交换应是在这里进行的,而存在于这些近邻之间的贸易活动则把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成一个紧密的网络。这些城市中心是供求交汇的地方,同时又是生产和管理经验聚集之处。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得到了交流,而这些信息都是关于如何发挥城市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崭新功能的。而在这一过程发生时,古代埃及并没有发展出城邦国家,只是这些城镇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正是在这些城市中,一个社会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在制度上的统治地位也在这里建立起来。这些变化是通过城市周围的大型贵族墓葬揭示出来的。包括大型的长方形墓室,墓壁有的用石材砌筑,有的则用厚木板加固,棺木也变得越来越厚重,随葬品越来越奢华。所有这些都是随葬日用器物的平民百姓墓葬所不及的。这种差别悬殊的现象无疑揭示出社会等级不断分化的趋势。这些大墓都单独组成一个墓地,显示贵族墓地已经出现。Hierakonpolis 已经发现两个这样的贵族墓地,这些长期存在的大墓及其所组成的墓地说明当时并不存在特别高贵的个人成员,而是作为一个人数并不太多的贵族社会阶层存在的,他们以这种方式故意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区别开来。这说明,贵族们必定在当时的城市中心经济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宫廷场所就是农业和工艺技术交汇的中心,就是当地经济和对外商贸聚集的中心,这与后来神庙经济在埃及国王的朝廷中所发挥的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位于 Hierakonpolis 南部的壁画大墓(Painted Tomb)则以其表现埃及王权的壁画而闻名于世。该墓的年代在那可达文化二期后段,其壁画描绘了一个英雄的事迹,其中一幅壁画是这个英雄正挥舞权杖打碎三个俘虏的头颅。这一主题就是所谓的“重击敌人”主题,后来成为埃及国王们权力的重要象征性艺术题材,以宣示他们对领土的主权。这使我们了解了埃及王权诞生的根源。

与此同时, 这些贵族墓地的地理分布也显示, 当时那可达二期文化并不处在同一个政治组织的控制之下。如在上埃及就发现了至少三四个以贵族墓地为中心的大型遗址, 这些遗址应是当时一些互相比邻的酋邦或原始国家的重心所在。而正是这些酋邦或原始国家的相互兼并, 促成了后来法老国家的诞生。到那可达文化三期, 贵族墓地只剩下两处了, 即 Hierakonpolis 和 Abydos 并且只在 Abydos 的贵族墓地中发现了最高首领的墓葬。

那可达文化三期即公元前 3200 年 ~ 公元前 3000 年间是“上下埃及统一时期”。关于这一阶段的论述, Seidmayer 认为必须首先弄清“统一”的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在古代埃及文化中是一个最根本的概念。古代埃及人把埃及看成是由两部分组成, 即上埃及和下埃及, 而法老王权则被视为这两部分的双重代表, 法老应统治这个国家的两部分。所以, 每个法老都一再于“上下埃及的统一”的宗教仪式上扮演角色, 以提高自己的王位权威。这种地理上的二元观点已经深深植入埃及人的思想之中。所以, 埃及的王冠、建筑形式、象征性的植物以及崇拜的神祇都相应地分配给国家的两个部分, 以使上下埃及在整个国家中没有任何差别。

那可达文化三期出现了最早记录国王名字的文字, 其中最后一位国王是纳迈尔, 即何鲁斯 Aha 或称美尼斯的前任和父亲 (如果文献记载正确的话), 他的名字在整个埃及被广泛传诵, 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纳迈尔最终统一了这个国家。在这方面, 一些装饰物品尤其是化装用的调色板、象牙刀柄和权杖头等, 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化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其中最著名的调色板是纳迈尔调色板, 它表现了埃及走向政治统一的艺术主题。这件调色板的一面表现的是头戴上下埃及白王冠的纳迈尔国王正挥舞权杖击打敌人的头颅, 这个敌人的名字刻在旁边, 或许代表了他的领土范围。在调色板的另一面, 顶部是头戴下埃及红王冠的纳迈尔国王及其部下正在检查两排被斩首的敌人俘虏, 这些场景反映了纳迈尔国王征服了下埃及的一块领土。在这一面调色板的下方, 是两只被俘获的对称缠绕的蛇颈黑豹。这一场景可与后来反映“上下埃及统一”的艺术品相比较, 这些艺术品是用两种植物来代表上下埃及, 植物也缠绕成对称的形状。

纳迈尔调色板和几支权杖头已确知是出自 Hierakonpolis 神庙的, 并且是供奉给何鲁斯神的。而 Hierakonpolis 因为拥有何鲁斯神崇拜而被法老时代的人们视为王国的起源地之一。因此, 尽管纳迈尔调色板不能给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答案, 但它的确代表了埃及走向政治统一、组成国家的最后历史阶段。它说明, 上下埃及走向统一的时期具有共同的特点, 这个时期并非一次突发事件,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国王美尼斯不应被视为国家走向政治统一的创始者, 而是后继者, 而其质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于是, 一个统一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实体从此覆盖了以自然边界勾画出的埃及所有疆域, 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模式从此构成了埃及历史的主体。

从上述可以看出, Seidmayer 对埃及文明起源历程的研究主要遵循着三个思路: 强调贸易在埃及文明起源中的关键作用; 以一些重要遗存 (包括大墓、城址和调色板等) 为中心探寻埃及政治结构和王权的成长过程; 强调只有王权统治覆盖了整个埃及才称上文明诞生。这三个思路也是西方其他学者研究埃及文明起源的基本特点。这对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有重要启示。

一般认为, 距今 5000 年 ~ 4000 年前的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陶寺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已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 这些文化所发现的一些重要遗存如大墓、城址和玉器等, 及其所反映的与三代文物制度的源流传承关系, 也一直是学术界探寻中国政治结构和王权成长过程的主要出发点。在这方面, 可以说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思路是相似的。当然, 龙山时代的中国不像埃及的前王朝时期文化面貌比较单一, 但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 龙山时代的黄河、长江流域主要文化区已能组成一个“原始中国”相互作用圈, 它们共享艺术风格和墓葬形式, 并奉行共同的宗教信仰 (包括萨满教和祖先崇拜)。通过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 主要以玉礼器为载体的礼制也应是“原始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 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不同区域间实现传播和影响的, 在这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和各种社会和组织结构又是如何得到相互认同和适应的, 这些目前学术界的关注和探索还比较欠缺。在这方面, 我们虽然未必把贸易视为推动区域间相互作用的

主要或惟一机制,但西方学者将那可达文化看成是一个流动和扩张的社会来研究,这一视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古代埃及人把埃及看成是由上下埃及两部分组成,法老应同时统治这个国家的两部分,这种二元地理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地缘政治观念。西方学者从这一点出发,强调只有王权统治覆盖了自然边界勾画出的埃及所有疆域才算文明诞生,这一思路也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存在位居“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具有正统政治权威的观念,后来进一步发展成“正统论”的学说。这种夺取天下之中以获正统政治权威的观念实际也是一种地缘政治观念。如周灭商后营建的东都成周就在“天下之大凑”的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以及郑州商城也都位于中原地区。而良渚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西进、北上中原地区,以及在登封王城岗修筑的龙山城等,表明这一地缘政治观念在龙山时代已具雏形。对此,有学者最近已经从考古学上作过探讨^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如何推进以礼制所代表的社会管理模式是龙山时代的发展主线之一,那么如何夺取“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以获正统政治权威的地缘政治观念,也是推动龙山时代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并且堪称“原始中国”相互作用圈酝酿形成的一项重要政治发明。实际上,这一地缘政治观念的出现是以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自然资源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对中原地区的争夺实际就是生存战略的选择,这也是古代中国长期以中原地区为经营重心的必然选择。从这一点看,二里头遗址以前所未见的青铜礼器所昭示的文明气象就不是偶然的,有学者所提出的夏代开始出现王朝文明与方国文明之分的观点^⑥还是很有道理的。只不过从最近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王朝文明很可能在陶寺文化所在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虽然不必像西方学者强调只有王权统治覆盖了自然边界勾画出的埃及所有疆域才算文明诞生那样,认为只有王权统治覆盖了自然边界勾画出的中国东部才算文明诞生,但中原地区以及由此衍生的“逐鹿中原以获正统政治权威”的地缘政治观念还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

三、西方对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启示

1992年,由当时就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的艾兰(Sarah Allan)博士主编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⑦,其中艾兰本人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一文,对20世纪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程作了系统回顾与展望,下面就对此文做一介绍,以了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基本历史和趋势。

西方第一个综合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其代表作是《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报告》和《中国青铜器新探》等。当时安阳的发掘报告还未发表,所以高本汉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研究器表特征,来为无铭文青铜器的断代提供科学依据。在这方面,高氏的方法是很有独创性的,他首先研究那些不同于公式化表述、属于“真正文献的”有铭文青铜器的特征,区分出商和周两大风格的青铜器,从而推导出一个能对无铭文铜器进行断代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又对他所界定的殷式青铜器进行了纹饰母题的类型学研究,目的是究明哪些纹饰母题可以与其他母题共见于同一件器物。他共划分出三组纹饰母题,其中A组为较形象化的母题,B组是较抽象化的母题,C组母题通常居于次要地位。他认为A、B组不共见,C组则可与A组或B组共存。

高本汉的这些观点早年就受到批评,其中比较有意义的是艺术史学家J. L. Davidson在B组抽象纹饰主题中又区分出两种不同形态,即分体饕餮纹与三重动物纹,并认为前者应早于后者。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分体饕餮纹主要存在于二里岗时期。如此,Davidson就成为西方第一位成功地将二里岗式青铜器视为商代青铜器之始的学者。

第二位比较有成就的学者是五六十年代的罗越(Max Loehr),其代表作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他的研究思路与高本汉比较相似,但结论却恰恰相反。罗氏在不参考考古资料和铭文的情况下,完全以艺术史的标准建立起一个包含五种艺术风格的青铜器演化序列。其中他认为前三种风格年代较早,而这一点现在已被河南郑州和辉县的二里岗期考古发现所证实。所以他的观点在现今的西方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当然,后来

通过妇好墓的发现证明他的整个序列实际上早在武丁时期就已存在了。而且有的学者已指出,至今仍未有考古证据证明风格Ⅰ早于风格Ⅱ,或风格Ⅳ早于风格Ⅴ。所以艾兰这样评价:罗氏的序列与其看成是一个前后连续发展的序列,不如看成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序列。

罗越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他认为商代由几何纹发展而来的青铜纹饰没有任何象征性或肖像式含义。这一观点也传给了他的学生,尤其是R. Bagley,他甚至声称:“从纹饰的发展史可以推测,商代青铜纹饰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图案,特定纹饰母题没有任何特殊的象征性含义。”

与此相反,西方的很多学者很早就尝试解释商代青铜纹饰的含义,包括生殖器崇拜、月神神话和老虎、太阳等许多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未被现代学术界所继承,因为这些纯理论性的探讨都建立在对中国早期艺术的想象之上,没有考虑同时期的铜器铭文或考古证据,而随着资料的积累和增加,这些观点也找不到证据支持。

在最近兴起的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饕餮等纹饰母题含义的观点中,尤以张光直的影响最大。他对一组以虎食人为纹饰母题的青铜器予以特殊关注,类似母题在美洲也有发现,而在南美洲神话中,美洲虎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这在神话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张光直推测老虎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是王,则人兽母题对于扮演拥有超凡魔力的萨满的王来说,就是执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行为;进而他认为,以饕餮为特征的神话动物应是能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萨满(巫)的代表人。

张光直的观点也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批评。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他所讨论的这组青铜器多出自中国南方,并不能代表商王朝本身。另一个批评认为商代用于宗教仪式的甲骨文中没有见到使用萨满的证据,因为萨满教通常应包含精神旅行或精神着魔以获得神的旨意。但甲骨的灼裂只是精神意愿的自然表现形式,这与萨满的精神旅行具有同样的功能,所以商代不存在萨满教。但随着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这种批评减少了,因为良渚玉器虽然无法证明商代存在萨满教,但它们的纹饰母题的确是一个人兽组合,而且人头上戴着一个羽毛头饰,而这应是萨满的装束特征,所以这种母题应该就是饕餮的起源。另一个更深入的批评来自于艺术史方面:张光直认为青铜器上装饰

的是神话动物,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有含义的,亦即它们应来自于一个写实的原始模型。而在这一点上,张光直运用了李济对青铜纹饰的排序方案,后者又与高本汉所谓写实纹饰年代较早的观点相似,而现代西方的多数艺术史学家并不认同这些看法。

在《龟之谜:中国早期的神话、艺术与宇宙》一书^⑥中,艾兰博士提出了自己对饕餮纹和其他纹饰母题含义的最新观点。她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神话及其神话思维的宽泛理论:她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其存在意义在于打破自然现实的界限,这并非因为早期人类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的界限,而是因为早期人类故意想要制造出一个存在于正常逻辑之外的形象,这个形象比世俗的东西更可怕,因为它拥有超出自然法则的神力;与之相应,所谓的原始艺术就把现实中的各种形象特征组合到一起,以打破自然现实的界限,如把某些形象故意拉长或收缩,经过这样处理的艺术形象就不是抽象的或几何形的,也不是描述性的;而且在神话艺术中,艺术母题是直接从宗教观念中产生的,而不像后来文字出现以后由文字明确表达的观念中产生的,所以原始艺术母题可以暗指神话中的主题,但不是具体描绘它。

从这一理论出发,艾氏认为商代青铜艺术中变化多端的饕餮、夔龙和其他纹饰母题具有上述原始艺术的特征:在商代艺术中,对现实世界的背离表现在把各种不同的动物的特征组合成一种形象,而两种动物的两种形象又可看成是同时存在的一种形象,一种形象或其一部分特征又可变成另一种形象,等等。除了极少数例外,商代艺术的这些特性甚至在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上也表现出现实世界被各种相互矛盾的形象所打破所否定,如枭的双翼会变成人面之上的蛇或角。因此,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艺术母题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商代的艺术家并不是要清楚地描绘真实的甚至想象中的形象,但他又的确在利用现实世界来构建他的想象。

由此,艾氏对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母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1)关于表现用做牺牲的动物(如羊、牛、鹿和虎)和人形象的一类饕餮,它可以暗指这些动物和人作为牺牲的主题,但饕餮本身并不代表它们;(2)关于表现龙并能构成独立纹饰母题的一类饕餮,从龙意味着黄泉、即死者在水下的世界和饕餮是对神灵奉献祭品的工

具出发,这类饕餮可以解释为表现了吃人的主题;(3)关于表现不用于牺牲的动物形象(如蛇、蝉、泉和大象等)的纹饰母题,则是因为这些动物都具有突破常规现实界限的特性;(4)关于“人在虎口”纹饰母题,艾氏支持张光直的观点,即应代表着与死亡有联系的吃人、杀人和牺牲。总之,尽管商代青铜艺术母题不能像“传统文学”那样做肖像式的解释,也不能理解其细节,但它们的确勾画出商代的宗教主题:死亡、吃人和牺牲。这些纹饰母题用奇怪的语言使死者和生者都突破了常规界限。

艾氏还对这些纹饰母题所反映的商代宗教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推测:殷墟时期的这种复杂的宗教主题与想象在二里岗期还未出现,因为这一时期的饕餮由两只大眼睛(应是一个兽面)和两侧还不明显的身躯组成。但是后来的饕餮正应是从它发展而来的,它是后来这种母题复杂含义的萌芽:兽面有两只大眼睛可能已在简单隐喻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看得见但看不清的世界。到了晚商,这种纹饰母题以及商人宗教中的类似主题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想象,纹饰的分体技法和频繁的变体以及更加明确的双关艺术形式也取代了先前还不很清晰的含义。所以我们已不能把二里岗期视为饕餮的开始,也不能像罗越那样认为它源于几何形图案。事实上,它的最早起源应是良渚玉器上的人兽纹饰母题。而在二里头期,虽然青铜器的制作还相当粗糙,大多还没有纹饰(二里岗期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也可用技术局限来解释),但在镶嵌铜牌饰上还是发现了原始形态的饕餮。

在文章的最后,艾兰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考古学已在整个中国开展起来,商代青铜器在几乎每个省都有发现,其中很多铜器属于很早的。这些发现的学术价值已超过了西方收藏的青铜器。因此,西方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我们必须建立起全新的理论模式来解释这些考古新发现。为此,她提出了今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走向:(1)我们已不能把商周青铜器视为在中原地区独立起源而后向周围传播,现在需要一个新的、非直线发展的模式来解释中原地区与同时期其他文化在铜器艺术风格上的相互影响;(2)罗越所建立的艺术风格模式目前仍然是惟一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他所建立的五种艺术风格早在殷墟期开始

之初就已非常发达了,所以殷墟期青铜器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艺术风格模式;(3)多数学者现在都已接受人兽主题的良渚玉器与饕餮之间有联系的观点,但它们在风格上是如何演变过渡的,目前仍不清楚,而对饕餮含义的解释目前也未完全弄清。

目前,我国对于以饕餮为代表的商周青铜纹饰的研究,虽然与西方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争论和问题,所以艾兰在文章最后所提出的三个走向实际上也是我国学术界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以饕餮为代表的商周青铜艺术并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艺术,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上古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值得我们借鉴西方学术界的视角去大力开掘和研究,这就需要我们能以开阔和开放的视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而在现今国际学术交流日渐密切的情况下,艾兰在文章一开始所说的话或许更值得我们玩味:“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和研究自己文化传统的中国学者,经常发现互相之间难以沟通,每一方都囿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拥有某些对方所没有的关键性认识或方法。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是最明显了。”

- ① Robert J. Wenke, *Patterns in Prehistory—Human-kind's first three million years* (the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② John H. Bodley,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ibes, States and the Global System*,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 ③ Gina L. Barnes,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99.
- ④ Regine Schulz & Matthias Seidel ed., *Egypt: The world of Pharaoh*, Konemann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98.
- ⑤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 ⑥ 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
- ⑦ Sarah Allan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London, 1992.
- ⑧ 中译本已于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汪涛译。

(责任编辑:李丽娜)